



【石石关心】

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治国理念，拿来西方的情人节，发展东方的市场经济也顺理成章。

当生日遭遇情人节

刘石

我的生日是阳历的2月14日，也就是西方的“情人节”。每到这一天，都会过得有些纠结。

我小的时候每年只有奶奶张罗着我过生日，她从来都是按照阴历算日子。奶奶去世后，我们家再也没有人张罗着过生日了。我从来也不知道自己阴历的生日，所以计算生日又回归了阳历。

很多年以来我对于过生日没有太多的重视和期待。如果是小朋友，每过一次生日都会与法定的独立年龄和某些权利拉近关系，也可以进入之前被禁入的许多领域，当然值得特别的期待；作为长者，每过一次生日便是延年益寿，便是不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为“东海”灌水，为“南山”添砖，当然值得庆幸和骄傲。而在我们这个漫长的中投年龄的芸芸众生来说，每过

一年不过是在自己岁月的年轮上再刻上深深的一圈，与人生的终点又拉近了距离，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在我看来，对于中年人来说，如果不是在战乱年代，“庆生”多少是一件“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营生。

我在猜想，中年人士庆生的需求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种可能性：要么是童年习惯的延续；要么是希望被家人和亲友重视的心理需求；甚至还有可能会成为向下属和管辖范围内的商家索贿的委婉的借口。我似乎与上面三种情况都不沾边，因而也没有过张罗着过生日的心理学和经济学动力。而且我总觉得，过度的仪式感和仪式感总是与“土豪”密不可分的。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的生日正好赶上了西方的“情人节”。原本不太重视或者常常被忘记的生日，现在总是被各种商家不断地提醒着。这些年来西风东渐，圣诞节、情人

节、感恩节、母亲节等西方的标志性节日开始登陆中国，虽然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但也颇受到入时者和年轻人的追捧，更成为商家狂欢的节日。

“情人”在中国传统的语言中最早好像是指感情深厚的友人。比如南朝鲍照的《骀月城西门廨中》诗中有：“回轩驻轻盖，留酌待情人”的词句。以后，“情人”一词就逐步过渡和驻足在男女之间的恋人关系上，即“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意思。我理解的西方“情人节”中的“情人”，大抵也是这个意思。

不过“国际惯例”总是抵挡不住“中国特色”。随着现代社会的进化和词语的发展，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情人一词在中国已经逐渐被专门用于特定的“不被法律所承认的恋人”之间的关系，其主体似乎就是人们俗语中的“小三”。因而在西方原本很明朗的“情人节”，在中国也变得暧昧了起来——

犹如这里的天气，好像已顺理成章演化为“小三”们的法定节日。

我不太清楚西方“情人节”的来历，据说即使在西方对于“情人节”的渊源也没有统一的说辞。民间的习俗总是美好愿望的表达，与之相关的传说大抵都是后来人的牵强附会而已。传说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得习俗显得“不俗”，使得流氓也显得文化而已。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考证和较真，更没有必要写信和自欺欺人。

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治国理念，拿来西方的情人节，发展东方的市场经济也顺理成章。既然教书育人可以市场化、救死扶伤可以市场化、慈善公益可以市场化，为什么爱情和生理需求不可以市场化呢？

前些年，因为业务的关系我常会在外面应酬。我发现，每逢2月13日这天，各个档次的餐厅的生意都格外

火爆，其火爆的程度甚至会超过2月14日的“情人节”这天。我猜想，2月14日这天“大奶”把老公们都看得紧，“大哥”、“大叔”和“干爹”们都难得请假，他们只好在2月13日这天提前为“小三”们庆祝节日，以示关怀和安抚。所以2月13日这天餐厅的生意会格外的火爆。

今年的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赶上了中国的“元宵节”，我又基本上是在出差中度过。当我坐动车赶到北京南站的时候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我与一个同事在火车站点了两碗炸酱面和两盘小菜。当我回到远在郊外的家里已经很晚，没有人想到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第二天的早晨起来，自然有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虽然从小就不太喜欢吃甜食，但是这碗汤圆还是令人感到很温暖。

(作者是种业专家、职业经理人)



【贾语村言】

名人看似呼风唤雨，在话语暴力面前其实非常软弱。

柴静生子 关卿何事

贾壮

大龄剩女的婚育已成社会难题。要是听说身边哪个剩女牵手成功，大家总会为她高兴好一阵子。

央视女记者柴静37岁才结婚，之前是标准的剩女。她在自己的书中记录了一段回乡看望奶奶的细节，从中不难看出家长对她婚姻问题的忧心。“她老了，我每年只有几次回家，给她洗澡，剪指甲，她喝中药，我在边上放一碗水，手里放一粒话梅糖，顶着她的额头哄她‘一口就下去了’，她冰凉的纹路印在我额头上。她叹口气，‘你怎么还不结婚呢，你结了婚我心里就静了。’”

去年初，柴静结婚了，临近年底又生了孩子，对于一位大龄剩女来说，这

是喜上眉梢的事情。奇怪的是，很多人却拿起了放大镜，从中看出了不少问题。比如有人就发现，柴静的丈夫此前已有婚育史，这场婚姻不够完美；又有人声称，柴静结婚之前有过恋爱经历，并不是白纸一张；还有人惊呼，柴静在北京拥有房产，而且位于高档小区。

时代在进步，人们的婚观念也与时俱进，大家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是，婚恋属非常个人的选择，若非至亲挚友，别人无权置喙。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大龄剩女只能找一婚丈夫；也没有什么道德要求，女士必须为丈夫保留自己的初恋；漂在北京很多年，买套房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放在其他人身上，这些情况都不会成为问题，但放在柴静身上，媒体就要大书特书，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她是个名人。

茶余饭后，需要谈资，读者有此需求，媒体当然会投其所好，这是娱乐新闻的生产规律。但是，在报道名人时，应该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区分。柴静的身份是央视记者，她以调查性报道见长，非典期间深入病房采访，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柴静思想新锐，文字优美，时常会就公共议题发表看法，加上平时交往的圈子多是文化人，所以有人就给她戴上了“公知”的帽子。严格来说，柴静不是娱乐明星，私生活没有多少“新闻价值”，一些媒体和个人对她的婚育大肆评论，是过分使用话语暴力。

名人看似呼风唤雨，在话语暴力面前其实非常软弱，媒体的不当报道给名人造成伤害的案例不胜枚举。美国已故摇滚巨星迈克尔·杰克逊长期

被莫须有的妻妾官司缠身，大小媒体便从中渔利；英国的戴安娜王妃殒命车祸，据称与狗仔队的死缠烂打不无关系。上个世纪30年代，一代名伶阮玲玉自寻短见，遗书中发出了“人言可畏”的悲鸣。鲁迅替她不平，在文章中写道，“无论你怎么描写，在强者是毫不要紧的，只消一封信，就会有正误或道歉接着登出来，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

可有人就是喜欢做画花别人额头的的事情。最近，又有媒体记者在机场拍到了柴静一家人外出度假的图片，迫不及待地告诉大家柴静生孩子的消息，而且记者还从“一位知情人士”处获悉，孩子出生地是“美利坚合众国”。于是有人开始质疑她言行不一，辱骂

她面目虚伪，断言她“名利都捞差不多了，终究会移民”。

不知道这位记者同行的消息源是否可靠，就算柴静赴美生子的消息确切无疑，也算不得多大的罪状。柴静在节目中针砭时弊，她的文章有济世情怀，于是有人给她打上“爱国斗士”的标签，在他们看来，“爱国斗士”必须把孩子生在自己的国家，否则就是不爱国。那些提出质疑的人，实际上有着偏激的“爱国洁癖”，爱国的人不能批评，爱国的人不能离开。其实，生不生孩子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孩子的出生地也是个人的自由，普通人有此自由，名人也应当有此自由。做顶爱国的大帽子往别人头上扣，进而要挟别人的言行，是更加可怕的暴力。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土地财政难持续 广州发展临大考

今纶

就各个城市的地方债问题，某投资人最近在网上发表了《退潮时，深圳是唯一一个穿着内裤的城市》一文，引起众多议论。该投资人在对比了全国多个城市的地方债审计结果后，发现负债率最低的极有可能是深圳。

相比之下，兄弟城市广州的地方债负债率就太高了。《北京青年报》去年8月份的报道显示：广州市财政局公布了2013年的“债务明细”，GDP在全国城市排名第三的广州市，已经被庞大的债务余额逼向风险警戒线。

与此同时，广州依然豪气冲天，宣布今年将有11条(段)地铁全面开通，今年计划完成新线建设投资超过170亿元。一方面债台高筑，一方面大

搞轨道交通建设，这里面有没有过度建设的问题？就以地铁为例，广州一口气上这么多地铁项目，财力可以承受吗？

数据显示，广州去年卖地收入838亿，超过全市财政总收入的1/3。估计很多人都会大跌眼镜，号称千年商都、华南地区经济中心的广州在财政总收入方面居然让卖地收入占了1/3，这说明什么？说明财力吃紧。既然财力吃紧，为什么又要投入巨资继续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呢？显然，为了政绩而拉动GDP，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广州的城市发展其实已经进入一种迷茫的阶段，或者说已经逐渐内地化，逐渐丧失了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锐气和转型勇气。去年11月13日，广州市人大财经工委视察地政局和国税

局时，广州市地税局汇报称，剔除房地产税收的增幅，地税收入实际在下降。而与此同时，广州支柱产业有弱化现象。这种靠房地产吃饭的状况显示，广州的产业结构转型实际上已经落后于经济规律本身的运行轨迹，再不痛下决心大幅转型跟上，后果堪忧。

广州疲态尽显，本该喘口气，与民休养生息，认真反思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但是，从近期市政官员的一系列言论和某些政府部门的表态来看，规模宏大的基建难以停下脚步，正在加速推进，既然财政收入不振，那么，广州在今后几年将更加倚重土地财政的收入来还债已经成为了唯一的选项。

此前，广州国土部门甚至曾经提出在2014年逐步取消楼市限购限价政策，其用意更是非常明显：推高房

价，维持土地市场的火爆。因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当天正好表态称：2014年，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继续限购限价。广州被迫在随后否认将取消楼市限购限价政策。

新年伊始，广州的番禺和黄埔，地王频出，房价上涨意愿强烈。政府继续狂奔在旧模式的道路上，举债大搞基建，卖地还债，采取各种办法维持房价上涨，包括对“双合同”视而不见，限价政策已经被实质上洞穿。购房者则被迫压缩消费，为政府和银行打工。

现行模式的风险在于，一旦金融风暴等不可控的风险传递到广州，广州的房价很难独善其身，届时，后果不堪设想。1997年，广州的房价曾创一时新高，后从巅峰跌落，很多购房者是

迟至2006年、2007年才“解套”。从来就没有只涨不跌的房价，类似广州这样的城市，将整个城市未来数年的发展动力、财政收入来源与房地产、卖地收入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对市民消费能力的一种实质上的掠夺，同时也将城市置于危险的路径之上。外国市场，包括香港的房地产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即会引起整个城市的紧张，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剧。

风险正在逼近，继早前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在港推出的首个新盘降价25%开售后，香港另一大地产巨头新鸿基，也于2月10日降价40%出售其位于元朗的新住宅项目。广州和很多内地城市，面对可能的风暴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

(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因缘有果 知难行难

木木

穷算命，富烧香。

每年的正月初一，北京雍和宫门外总会早早地就排起长长的等待上香的队伍，庙门一开，人们争先恐后，抢烧“头炷香”。其实，不唯雍和宫如此，北京但凡有点儿“来头儿”的寺庙，大都能享受到同等规格的待遇。

香火日盛，应该算好事儿吧。起码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许许多多人的生活确实实实在在地好起来了。生活好过起来的人们，上起香来就冲劲十足。

不过，据说今年雍和宫带头儿“改革”，提倡烧“短香”、“细香”，要为净化北京空气做出新贡献。善哉！虽然信众

们多年养成的习惯改起来不容易，但毕竟是开了头儿，总让人看到了一丝亮色。其实，佛陀、菩萨住在天上，那里的空气应该好得很，下界信众不管不顾、烟熏火燎地烧起来、烧上去，估计神仙们也受不了，别说降福，不赐罪已属万幸了。

虽然佛陀讲究因果，但打着因果的旗号糊弄佛陀的做法终究不妥。烧高香、磕响头和佛陀降福之间大概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如果有人偏认为二者之间就是个因果关系，那大约就和骂佛陀是贪官无异了。按照较为纯粹的佛法，心存慈悲，方能证道；慈悲为因，证道为果；这才是正因正果，和烧不烧香、磕不磕头，关系应该不大。

邪因大约是得不出正果的。对此，林则徐的“十诫”就颇一针见血：父母不孝，奉神无益；妄取人财，布施无益；存心不善，风水无益……

因果关系是很复杂的一对关系，不但存在“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甚至还分出“直接——间接、主要——次要、重要——一般、偶然——必然”等等关系来，因此，不但普通人不容易搞得明白，即使哲学家，许多时候也往往被绕进去。所以，追究因果关系，就要格外小心；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掉到沟里去。弄一身泥，赔笑大方，还在其次，如果弄得晕头涨脑，辨不清东西，并由此误入歧途，那就误的事儿可就大了。

比如一个大市场，里面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人们进入其中，即使踏起脚尖儿也难免溅一鞋一身泥水；时间长了，市场里来的人自然就少，市场自然就冷清。面对这样的结果，你就不能埋怨旁边的那个干净又整洁、人们进入其中都能身心愉悦的小市场。那显然并非大市场冷清之“因”，起码不是“主因”，把握不住这一点，估计大市场就永远难有改观；因为找不准“主因”，又怎么能对症下药呢？

要想让人们喜爱这个市场，恐怕首先要做的还是清理垃圾、修整道路。垃圾清理走了，苍蝇、蚊子、老鼠、蟑螂也就难有藏身之处了；这些东西，一贯是恶人的高手，少了它们，市场人气

兴旺起来，也就有了基础。道路修整好了，人们走在上面，不怕藏脚、不担心摔跤，肯定就可以专心干些正事儿了。

因此，面对“因果”要小心。欲求“正果”，显然要找到“主因”；找到“主因”，最终求得“正果”应该不难，毕竟佛陀、菩萨们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来都不舍昼夜。因此，与其摸黑起早儿、赶着去排队烧香、敬佛、许愿，远不如心存善念、踏踏实实、持之以恒地干点儿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的正事，更让佛陀欣慰。敬佛如此，做其他的事情，应该也如此。不过，中国人坚守守旧习惯，一向韧劲儿十足，新习惯养成恐怕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缘木求鱼】

中国人坚守旧习惯韧劲十足，新习惯养成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广深今谈】

广州疲态尽显，本该喘口气，与民休养生息，认真反思发展中面临的问题。